

大都市近郊乡村公共空间治理 ——以上海环东村为例

Public Space Governance of Rural Communities near Metropolitan Areas: Taking Huandong Village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寇怀云* 董楠楠
KOU Huaiyun* DONG Nannan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92)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2)12-0080-06
DOI: 10. 12193 / j. laing. 2022. 12. 0080. 011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2-08-16
修回日期: 2022-10-07

摘 要
大都市近郊村是城乡融合过渡地带, 双向的人口和资源流动对乡村空间环境带来冲击, 公共空间治理已超出物质环境整治的范畴。梳理乡村公共空间内涵与特征, 提出与大都市近郊村“过渡与融合”特征相匹配的公共空间治理目标——包容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与构建社区公共秩序认知的共识。结合《上海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 提出保证公平与兼顾差异、品质提升与底线保障、特色保护与灵活利用、复合集约与参与引导4组针对大都市近郊乡村的公共空间治理价值导向。以毗邻上海张江高科园区的环东村为案例, 借鉴《导则》的场景引导方式, 以4种代表性场景作为示范, 提出大都市近郊村公共空间的愿景设想和治理策略: 乡土文脉场景强调内生型公共空间的特色识别与强化, 集合创新场景带动零散低效空间的创造性利用, 未来创业场景侧重嵌入型公共空间的品质提升与带动, 参与融合场景引导聚集性空间的社区共识构建。

关键词
乡村公共空间; 大都市近郊村; 景观治理; 乡村社区生活圈

Abstract
In rural neighborhoods near metropolitan areas, the transition zon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bidirectional flows of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challenge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space in rural neighborhoods, which has gone beyond improving physical environmen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ublic spaces.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transition and integration” in suburban villages of metropolises, it puts forward the goals of public space governance: meeting the diverse needs of different residential groups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consensus on public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Planning Guidelines of Rural Community-life Circle in Shanghai*, the paper proposes the value orientations of public space governance that may ensure fairness and tolerance for differences, guarantee a bottom line of quality improvement, provide protection and flexible utilization of features, as well as integrat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space with community engagement. It explains its opinions and offers governance strategies for the vis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s near metropolitan areas. Exemplified with Huandong Village adjacent to Shanghai Zhangjiang Hi-Tech Park, drawing on the scenario guidance method in the *Guidelines*, it provides four representative scenarios: local contexts emphasize the identifi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dogenous public space, intensive innovation drives the creative use of scattered and inefficient spaces, future business startups focus on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embedded public spaces and their facilitation of the entire environment, and participation and integration scenario guides the building of community consensus.

Keywords
rural public space; suburban villages; landscape governance; rural community-life circle

寇怀云
1974年生/女/山东淄博人/博士/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城乡遗产保护与社区景观治理

董楠楠
1975年生/男/安徽阜阳人/博士/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khy@tongji.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绿色宜居村镇技术创新”(编号: 2019YFD1100702)

乡村公共空间作为乡村社区交往和集体记忆的承载,是乡村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大都市近郊村作为城乡融合过渡区域,是城乡人口就业和居住生活的缓冲地带,既承接部分城市功能的外溢,也是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临时落脚点。双向的人口和资源流动,对乡村公共空间形成巨大冲击:一方面,公共空间的服务对象发生变化,对公共空间的功能需求随之改变;另一方面,公共空间的乡土景观风貌、地域场所感和空间社会联系,相对一般乡村受到更大的挑战。因此,需要在明确乡村公共空间范畴与特征的基础上,针对大都市近郊村的特征,确立公共空间治理的目标与价值导向,探索治理策略。

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镇环东村,具有城乡融合过渡地带乡村的普遍特征。环东村紧邻张江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且位于张江科学城规划范围内,距离陆家嘴国际金融中心仅15 km。村内租住混合度较高,本地村民与城市低收入群体、外来务工群体、乡创群体等组成马赛克式空间布局^[1]。环东村作为张江镇唯一的保留村,并被列入上海第三批乡村振兴示范村。

研究在梳理乡村公共空间内涵与整体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大都市近郊村的特征及相应的公共空间治理目标;结合上海规划资源局2021年12月发布的《上海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以下简称《导则》)^[2],提出针对近郊村的治理原则与价值导向;以环东村为案例,以场景引导的方式,讨论和阐释大都市近郊村公共空间的愿景设想和治理策略。

1 乡村公共空间特征与治理目标

1.1 乡村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并进行日常交流或公共活动的场所,在城乡规划领域

通常指外部开放空间^[3]。社会学领域对公共空间的研究侧重于讨论社会与空间的相互塑造过程,关注空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力^[4-5]。空间政治学范畴的公共空间对应于“公共领域”(public realm^[6]/public sphere^[7])概念,注重空间的政治符号属性、统治或治理属性以及多元主体对空间话语和权力的争夺。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具有多重涵义的概念,公共空间在物质形态之上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意义,在规划研究领域已受到普遍认同和重视^[8]。

乡村公共空间指乡村日常生活交往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室外场所。与城市通常所指的人工建设而成的公共开放空间不同,乡村公共空间广泛存在于生态、生产和生活三种形态的乡村空间中,既有村内的专门活动场地,又包括村外的田间地头、河边林下等。对于大都市近郊乡村,由于自然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空间均有限,公共活动更多集中于社区生活空间范围。

1.2 乡村公共空间整体特征

与公共服务配套导向的城市公共空间不同,乡村公共空间并非均为有意识的规划建设^[9]。社会学学者根据乡村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将其划分为非正式的公共空间(村庄内生型)与正式的公共空间(行政嵌入型)^[10]。当前包括行政在内的多种力量积极推进乡村规划建设,因此可发展该分类为“内生型”和“嵌入型”两种公共空间体系^[9]。

内生型公共空间由乡村生活习惯和交往需求自然形成,是“不断适应环境和各种变化的自组织空间”^[11]。既有村头巷口、房前屋后、河边、商铺口等邻里日常交流的非正式空间,亦有传统村落或少数民族村寨中常见的祠堂、戏台、鼓楼坪、芦笙坪等正式的

传统节事活动场所。嵌入型公共空间则由政府、社会组织等力量推动建设,如健身中心、道路广场、中心公园、游园、文化园/中心、社区花园等,属于系统建构的“他组织”公共空间^[12]。在大都市近郊村,由于资金投入和建设活动较多,嵌入型公共空间类型和占比亦相对较多。

两类乡村公共空间总体上呈现两方面的特征:(1)功能复合或空间叠合。如健身广场,亦可作为村民平日纳凉攀谈、村内议事聚会场所,甚至晒场等。此类复合或叠合不受所属体系限制。(2)规模较小、布局分散。该特征对于日常交往的非正式空间尤为明显。另外,同一功能的空间,亦可能归属不同公共空间体系。比如集市本是一种传统的非正式交易空间,由乡村社会自发形成,是村民交往的重要公共空间。随着合作商店、超市等形式的社区商业陆续进入乡村,传统集市逐步被取代而消失,近年针对社区生活需求而在社会组织、规划专家推动下设置的集市,则归入外来嵌入型公共空间范畴。

1.3 大都市近郊村特征与公共空间治理目标

近郊村承担都市功能的溢出缓冲和人力资源的蓄积缓冲,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群在此聚集,外来租住人口数量经常大于本地户籍人口,并不断流动更替,居住群体呈现多元化和不稳定性。因此,过渡与融合成为近郊村最为明显的特征。“过渡”属于不稳定的变化过程的中间态,从公共性治理的角度,需要满足“共”性需求,包容变化的两端;“融合”则是多元群体求同存异的过程和状态,需要建立“公”的秩序,即各群体共同遵守的乡村公约与规则。空间的公共性“不仅是一种关于空间和结构的实际类别,更是一种关于社会成员的身份、归属、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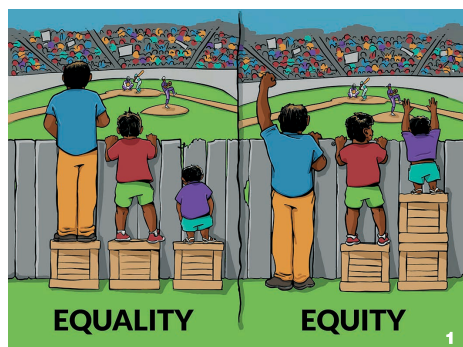


图1 平等与公平 (源自<https://interactioninstitute.org/illustrating-equality-vs-equity/>)

Fig. 1 Equality and equity

的规范建构”^[13]，该界定包含了上述两方面的要求。考虑大都市近郊较高的多元化程度，比之社区身份认同更为可行和必要构建社区共识，由此包容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和构建对社区空间公共秩序认知的共识，成为大都市近郊村公共空间治理的两个目标。

包容多元需求与构建社区共识，与大都市近郊村的过渡与融合特征相匹配，然而在大都市近郊有限的空间资源约束下，两个目标具一定程度的拮抗性，其达成需要从价值导向和治理策略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索。

2 治理原则与价值导向

《导则》以满足乡村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和提升乡村生活幸福度为目标，提出“公平与差异、品质与关怀、更新与利用、复合与集约”4项规划原则。针对过渡与融合的特征，依据上述包容多元需求与构建社区共识的目标，大都市近郊村公共空间治理的价值导向，可在4项原则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发展。

2.1 保证公平与兼顾差异

平等 (equality) 与公平 (equity) 的讨论在西方已持续半个多世纪。平等在于分配均匀，公平则关注最终结果，如图1经典漫画所示：

无论年龄身高差异，给予同样的垫子，是平等；提供不同的垫子以垫成同样的高度，则属于公平。公平与平等结果的差异显而易见。

公平作为空间景观治理的价值观，其核心在于保证各类人群获得同样的景观体验结果。因此，需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异性的治理策略，以保证结果的公平，营造消除排他性的真正意义的公共空间。《导则》强调了年龄段的差异，要求满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的保障性需求。大都市近郊村多元居住群体之间存在更多的差异性，比如租户对传统公共空间使用的拘束和村民对嵌入型新空间使用的拘束，因此需从更多维度探讨保证公平的差异性策略。

2.2 品质提升与底线保障

公共空间品质不仅在于客观的空间环境质量本身，而更加取决于使用者主观的心理感受，是物质空间、心理环境、场所意义和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综合考量^[3]。对于大都市近郊村，需针对多元主体的行为与需求特征，来提升居住群体对社区公共空间的使用满意度与形象认知。

空间品质随设计理念、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可不断提升，并无上限；品质的底线则可明确设定，保证支持公共活动、维护空间形象和满足安全舒适等基本需求。《导则》亦强调了设施配置的底线管控。通常各类空间设计规范起到该管控作用，然而考虑大都市近郊村的经济和政策支持条件，现阶段空间治理则完全可设定高于规范的管控要求，达到必要的人本关怀。

2.3 特色保护与灵活利用

特色 (feature) 是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具有可识别性 (identity)^[14]，因此

可作为培育社区共识的资源。绞圈房、盐灶、水网肌理和桥文化便共同构筑了浦东地区的乡土特色。特色并不完全意味着历史和传统，新元素亦可形成特色。

大都市近郊村作为过渡地带，空间上易给人“非镇非村”感。因此，在《导则》提出的更新与利用原则上，强调识别与挖掘乡村特色，并进行保护或活化利用，以塑造可识别性的公共空间，积淀形成集体记忆。另外，大都市近郊受集中归并和建设用地减量影响，村内通常零散分布着一些闲置或临时性空间，亦可作为一种资源，在权属和政策明晰的前提下，以适当的公共活动功能进行过渡性、轻介入的灵活利用，形成特色公共空间。

2.4 复合集约与引导参与

功能复合的空间集约利用方式，如分时段配置功能、可灵活组合的设施等，不仅使有限空间满足多样的需求，而且可聚集人气，保持空间活力，从而有助于大都市近郊村的社区凝聚力构建。

乡村公共空间通常具备高度的功能复合性，只是伴随居住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某些传统的公共性功能被减弱或消解，比如村口广场夏日纳凉或冬日围坐烤火的日常交往场景，随各家空调的安装而消散。因此，在《导则》提出的整合功能的同时，针对多元群体的共识构建，引入新功能并引导各群体的参与，亦是大都市近郊村公共空间治理的一部分内容。

3 示范性场景治理策略

乡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形态以及使用主体诉求的多样性，使其治理并无统一模式，《导则》的“场景引导”是一种可借鉴的



图2 环东村水系图 (吴雨峰改绘自日本陆地测量部1937年发行的张江地图)
Fig. 2 Water system of Huandong Village

示范性引导方法。本研究以上海近郊环东村为例,运用场景引导的方式,提出示范性的公共空间治理策略。

3.1 环东村社区公共空间概述

环东村具有大都市近郊典型的过渡与融合特征。全村户籍人口4 895人,外来人口则超过8 000人,人口倒挂明显,租住混合;旨在推进闲置农房租赁的人才公寓项目,已引进张江高科园区近百位年轻白领入住;乡创企业亦在陆续介入,目前已有一家文创公司常驻村内。嵌入型公共空间如中心公园、生态园、人才公寓等均对全村开放,然而实际上本地居民较少在生态园和人才公寓等新空间范围停留,主要在中心公园或自家宅旁广场活动;租客较少使用中心公园公共空间,表示作为外来者感到拘束。传统的路边、桥头等内生型公共空间时常被停车、晾晒等个

人需求所占用。在环东村的交通专项整治中,工作人员亦发现村内外的交通拥堵很大原因是乱停车导致,并非完全是停车位缺乏及道路系统本身的问题。可见在居住群体的实际需求、心理感受以及空间秩序的行为约束层面,均需加强对空间“公共性”的建设。

根据环东村现状特征,以包容多元需求和构建社区共识为目标,并结合上述价值导向,提出乡土文脉、集合创新、未来创业和参与融合4种示范性场景构想,探讨大都市城郊村公共空间的治理策略。场景主题各有所侧重,但与价值导向并非完全一一对应,各场景亦并非割裂,而是综合运用,以诠释治理目标、价值导向与策略。

3.2 乡土文脉场景——内生型公共空间的特色识别与强化

乡村相对于城市空间的建设干预较少,

自然地理和乡土文化在历史的层层积淀中得以保留,成为乡村整体性的空间特色。环东村的空间肌理即可见明显的滨海水网特征,河渠纵横交错,民居沿河分布(图2,图3)^[5]。历史上因水网航道和盐业生产,形成以制盐管理单位“灶”命名的河浜或地名,以及数量众多的木桥、石桥,并衍生出相应的文化习俗^[16-17]。目前古桥已被水泥桥替代,尚存桥弄里、三灶浜等地名。

乡土文脉场景以水网肌理和历史脉络作为底色,依托散布在水岸、桥头、巷口等特征性节点的内生型公共空间进行营造。治理重点需从村落整体着手,首先识别出这些自发形成的传统公共空间;同时进行地方文化景观的解读和溯源,梳理盐制业影响下的滨海水网乡村肌理形成和演变脉络;进而以设计手段强化内生型公共空间与地脉文脉的关联,并将散布的公共空间以具有标识性的



图3 环东村局部鸟瞰(徐瑾 摄)
Fig. 3 Aerial photo of part of Huandong Village



图5 环东人才公寓
Fig. 5 Talent apartment in Huandong Village



图4 “组合书报亭”场景设计(霍钧贤 绘制)
Fig. 4 Scenario design "Combined Newsstand"



图6 无人售卖亭
Fig. 6 Self-service kiosk

设施、小品、游步道、骑行绿道等形式，串联形成网络，衬托乡村整体的特征和可识别性，从而构建和丰富本地居民及外来群体集体记忆。

3.3 集合创新场景——零散低效空间的创造性利用

乡村中往往散布一些既不在宅旁也不靠路边的小块场地，因规模不大、缺乏公共设施配置而利用率较低。依托该类场地可营造集合创新场景，通过创造性的改造，提高空间舒适度和利用率，激发空间活力。

集合创新场景是一种近郊乡村实验田，以乡村文化特色为基础，既可借助外力注入，

也可通过本地自发，进行创意设计和个性化营造，以临时性景观为主，增加四时变化和创意更新，把乡村低效公共空间转化为活跃元。该场景营造的过程，亦是促进参与、营造特色的过程。如图4所示可灵活拆卸的组合室外家具设计，即可置于街角、水边小广场等处，增加多样、趣味性的功能空间。

3.4 未来创业场景——嵌入型公共空间的品质提升与带动

在科创中心建设和乡村振兴双重驱动下，乡村人才公寓在上海近郊村陆续出现。环东村人才公寓是一片由十几栋农宅构成的组团，周边有农田、果林、水系等田园景观要素，

整体独立性较强。农宅整栋或部分房间用于租赁，有些户主仍然保留部分自住。由于有统一的运营公司和物业管理，空间环境得到较好的维护，然而也正因此，容易形成处于村落中的孤岛(图5、图6)。

未来创业场景契合人才公寓的性质，应以城乡一体化理念，营造双创思想交流碰撞的特质公共空间，为入住者提供无差别的公共环境和设施，促进与村内居民尤其是中青年创业人群之间的交流。该类嵌入型公共空间，治理的关键在于建立与乡村社区的联系，使空间公平共享，同时营造乡土特色空间中的时尚氛围，带动乡村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

3.5 参与融合场景——集性空间的社区共识构建

参与融合场景是通过多元群体的合作共建，构建社区共识的最为直接的方式。场景构建首先通过调研，找到各类群体共同的需求，并从中选择易于组织实施、具人群黏附性的项目切入；其次选择居民均较熟悉、无陌生和排他感的空间，往往是可达性、聚集性强的空间，如村口、桥上、中心广场等；最后寻找和动员各群体中的能人和积极分子，带动社区所有群体共同参与场景的策划和组织建构。

根据桥弄里组团“公共空间与日常需求”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调研(表1)，买菜不便、菜场缺乏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仅次于停车位问题；组团中心的桥，则是使用率最高的特色场所。在该调研结果的支持下，研究提出在中心桥周边定期组织农夫集市的方案。后续访谈中被访者大都积极支持，表示愿意参与农夫集市的组织建设，并提出合并组织跳蚤市场、社区物物交换等建议。

表1 公共空间与日常需求调研主干问题
Tab. 1 Main issues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public space and everyday needs

序号 No.	问题 Questions
1	您最常使用或停留的场所: 公园/生态园/沿河/桥/自家宅旁广场绿地/农田林地/其他
2	您认为环东村最有特色的场所 (开放问题)
3	您对以下各项的满意程度: 交通状况/景观环境/健身场地/文化活动/邻里关系/治安状况/生活便利
4	您最期待村/居委提供的服务或帮助 (开放问题)
5	您对完善村内公共空间和环境的建议 (开放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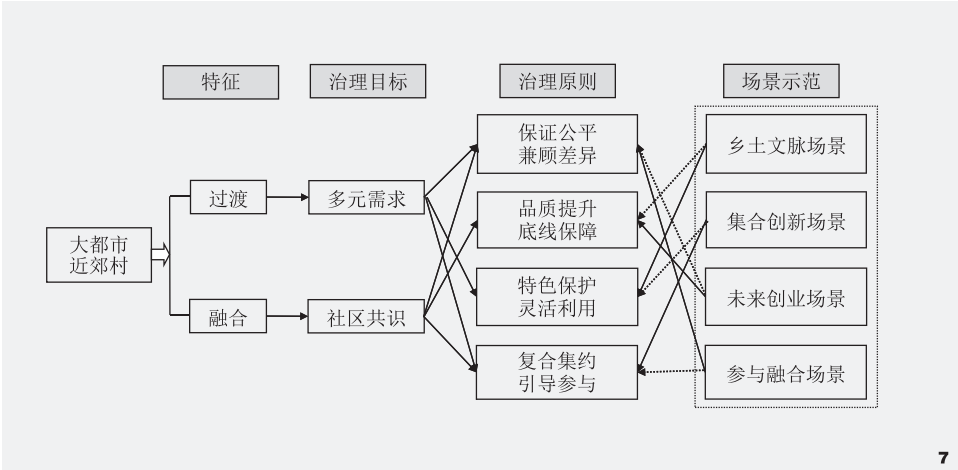


图7 大都市近郊村公共空间治理思路
Fig. 7 Framework of public space governance of rural communities near metropolitan areas

4 结论

大都市近郊乡村空间在当前各级政策推动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治理下，日趋生态环保和整洁美观，尽管卫生环境和设施还有很大提升和改善的空间，但公共空间治理的难点并不在于物质环境本身，而是针对近郊村多元居住群体的空间需求的包容和社区共识的构建。借助大都市的财政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资源，顺应内生型自组织空间和嵌入型他组织空间的生成原理和空间形态特点，在共同的价值导向下采取场景化的治理策略，是达成近郊村公共空间治理目标的有效路径（图7）。

公共空间治理亦是社区秩序生成和持续维护的过程，无论何种场景类型，治理

中均需共同讨论制定公共空间使用和维护的规则，并纳入乡约共同遵守^[18]。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体现出的社区积极性和创造力，以及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的乡村社区规划师制度，增强了乡村公共空间治理成效持续维护的可行性。

以上海环东村作为案例，尽管具有一定的时空局限性，但研究着重于案例所呈现的城乡融合过渡带的共有特性。另外，本研究提出4种示范性场景设想，仅为代表性的枚举，并不能穷尽所有场景类型，更全面的大都市近郊地区性案例和场景化策略有待持续的研究。

注：文中图片除标注来源外，均为作者自绘。

参考文献

[1] 熊易寒, 曹一然. 空间再分配: 城乡接合部治理的政治学意义[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7(01): 54-66.

[2] 上海规划资源局. 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R]. 2021.

[3] 周进, 黄建中. 城市公共空间品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J]. 建筑师, 2003(03): 52-56.

[4]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68.

[5] 布迪厄. 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G]//包亚明.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292-314.

[6] ARENDT H. The Human Condi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7]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 王晓珏, 刘北城,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170-171.

[8] 陈竹, 叶珉. 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空间?——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与空间公共性的判定[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 24(03): 44-49.

[9] 李京生. 乡村规划原理[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1: 136-150.

[10] 曹海林. 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兼论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轨迹[J]. 人文杂志, 2004(06): 164-168.

[11] 李京生. 乡村空间的解读[G]//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乡村规划教学研究课题组. 乡村规划.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27-32.

[12] 王东, 王勇, 李广斌. 功能与形式视角下的乡村公共空间演变及其特征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3, 28(02): 57-63.

[13] 张静. 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24-26.

[14] 朱晓明. 基于刚性和弹性结合的特色村镇建筑风貌保护技术办法[R]. 2022, 08.

[15] 俞文彬, 寇怀云. 上海传统乡村聚落空间特征研究[J]. 城市建筑, 2021, 18(22): 87-93.

[16] 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环东中心村总支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环东中心村村委会. 环东村村志[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17] 上海市川沙县孙小桥乡委员会, 孙桥乡志编辑委员会. 孙小桥志[M]. 上海: 上海辽源印刷厂, 1987.

[18] 寇怀云, 魏程琳. 私人庭院到公共景观——乡村庭院景观的公共性与宜居社区建设[J]. 中国园林, 2022, 38(9): 46-50.